

【农民问题】

如何促进易地扶贫搬迁户的社会融入

——基于社交距离视角的分析

张晨¹,张正岩²,马彪^{3*}

(1.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杨凌 712100;2.中国人民大学 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北京 100872;3.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金融学院,北京 100070)

摘 要:基于 2019 年 8 省 16 县易地扶贫搬迁户的微观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社交距离对搬迁户社会融入的影响。研究表明,社交距离是影响搬迁户在迁入地社会融入程度的重要因素,物理距离、心理距离、受偏见程度均对社会融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结果较为稳健。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社交距离对社会融入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不同的安置方式和安置位置影响不同,社交距离越大,对分散安置户和城镇安置户社会融入的阻碍作用越大。因此,社会融入的提升需要不断促进搬迁户与原居民的交往和互动,通过举办文化娱乐活动、相亲活动等形式,推动搬迁户与原居民有效交往,消除搬迁户与原居民间的心理隔阂;努力为搬迁户营造公平、公正的生活环境,尽可能消除原居民对搬迁后的歧视与偏见,避免双方因利益纠纷而发生矛盾。

关键词:易地扶贫搬迁;社会融入;社交距离;异质性分析

中图分类号:D632.4;C91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7465(2022)06-0090-12

一、引言

易地扶贫搬迁为生活在偏远地区、生存环境较差的贫困户提供了改善其生活水平的机会,一是通过搬迁至经济较发达、资源较充足的地区,为他们的生活改善提供了物质基础^[1],二是迁入地相对优越的经济基础对他们产生正外部性,为自主减贫提供内生动力^[2]。然而,搬迁仅是精准脱贫民生工程的第一步,搬迁户在迁入地的社会融入才是决定贫困户能否长期脱贫的重要因素。社会融入不仅反映了搬迁户在迁入地经济、文化方面的适应过程,而且在心理和身份层面对搬迁户的经济行为产生深刻影响。虽然易地扶贫搬迁为搬迁户提供了可能改善其生活水平的社会经济环境基础,但搬迁户往往面临适应较慢、融入较难的问题。贫困户由于较低的人力资本存量,往往难以在迁入地劳动力市场处于有利位置^[3]。同时,移民搬迁打破了搬迁户原有的社会网络,其在迁出地的社会资本在迁入地处于失效状态^[4]。因此,为巩固易地扶贫搬迁有效脱贫的成果,保障贫困搬迁户在迁入地的长期稳定发展,需要结合中国易地扶贫搬迁人口的搬迁特征,梳理出影响搬迁户社会融入更有效的驱动因素。

对于易地扶贫搬迁户来说,社会融入是指搬迁户单向地在迁入地的主动融入,反映了该群体在迁入地的包括经济、社区、文化、心理和身份融入等多个层面的适应情况^[5]。易地扶贫搬迁群体如何在迁入地实现社会融入,一直是学术界关注和讨论的热点问题。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

收稿日期:2021-12-1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与交流项目“易地扶贫搬迁的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影响评估”(7186114700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项目“中国农业农村渐进式改革的理论框架与行动逻辑:兼顾多目标发展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动态调整”(72141307)

作者简介:张晨,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张正岩,男,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生;马彪(通信作者),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讲师。

了大量的有益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从搬迁户的视角出发,分析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公共服务政策等因素对社会融入的影响。人力资本是影响搬迁户在迁入地社会融入的主要因素之一,主要包括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和技能水平等。受教育程度决定了搬迁户在迁入地取得工作的上限,受教育程度越高,工作越稳定,收入相对越高,这会促进其在迁入地的社会融入^[6]。健康的身体状况无疑是任何经济行为的重要基础,身体健康会影响每天的精力和心情,对社会融入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良好的社会融入与积极的健康结果有关^[7]。除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外,技能水平也是人力资本的重要方面,搬迁群体通过接受培训、学习新技术和经验积累等不断累积人力资本,进而促进社会融入^[8]。社会资本反映了搬迁户家庭依赖社区而得到的支持和指导,社会资本会使他们对社区产生更大的认同感,从而增加社会融入的可能性,因此,在一个多民族的城市社区中,社会资本是成功实现移民社会融入和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9]。均等化的公共服务政策可能减少搬迁户与原居民之间的福利差距和社会冲突,促进城市部门的资本积累、经济增长和社会融入进程^[10]。换句话说,移民搬迁群体在刚进入迁入地时,其经济状况处于相对劣势,心理也较为敏感,生产、生活方式等还需进一步适应,在某种程度上移民比原居民需要更加多样化的、更有利的公共服务政策,而良好的社区政策环境是其社会融入的催化剂,能够减少潜在社会冲突所导致的社会资源浪费,保障其社会融入^[11]。二是从社交互动的角度,研究搬迁群体在迁入地的行为变化。尽管现有研究从多个角度分析了如何促进搬迁户的社会融入,但忽略了社会融入是搬迁户与原居民互动的过程,即外部环境和原居民对搬迁户的影响^[12]。也有部分研究关注到这一问题,例如有学者从搬迁户居住位置的角度分析搬迁户在迁入地的福利变化,并认为搬迁户距离原居民越近,越可以加速搬迁户在迁入地的适应过程^[13]。除了物理位置,也有研究发现如果搬迁户与原居民存在较大的心理隔阂,可能会使搬迁户逐渐远离原居民,被动减少了自身可获取资源的渠道,对其在迁入地劳动力市场产生不利影响^[14]。此外,原居民对搬迁户的融入产生较大的影响是排挤与偏见^[15],即迁入地居民对搬迁户的接纳程度会对搬迁户各方面产生较大的影响^[16]。

以上研究为本文的分析提供了有益参考,但还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在研究如何促进社会融入时,忽略了搬迁户与原居民之间的互动和交往,并且对其中的驱动因素缺乏相关讨论,而这是社会融入的重要内容;二是社交距离对社会融入的相关研究还较少,并且缺乏较为严谨的因果分析,虽然有部分学者注意到物理距离、偏见程度等因素会对搬迁户的经济行为产生影响,但未对相关概念进行系统的定义,也未从社会融入的视角在实证层面予以证明。因此,本文试图从社交距离这一视角出发,基于中国易地扶贫搬迁贫困户固有的特征,结合相关理论,分析社交距离对于社会融入的影响,并利用中国易地扶贫搬迁8省16县2019年截面数据加以实证验证,以为搬迁户在迁入地顺利实现社会融入提供决策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传统社会融入理论认为,移民搬迁群体和迁入地原居民群体在经历接触、冲突、适应、融入4个阶段后,大多数移民搬迁户会接受迁入地的主流文化和生活方式^[17]。由于历史上大多数移民搬迁群体在人口数量上都远远低于迁入地原居民规模,搬迁户都处于较弱势的地位,基本会形成3种社会融入结果^[18]:一是搬迁户被当地文化所同化,完全接受迁入地生活习惯、知识形态,并以大多数普通人的状态融入社会;二是由于劳动力市场抢占、资源配置不均等问题,搬迁户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导致搬迁户被排挤,沦为社会边缘群体,他们无论是在权利还是在资源方面都处于劣势地位;三是搬迁户在与当地人接触的过程中,不断重建自身的社会网络,发挥原有人力资本优势,在迁入地转变为精英居民。

由上可知,无论是哪种融入结果,其核心过程都有一个共同阶段——接触,即搬迁户与原居民的接触是社会融入的根本动力和核心基础^[19]。那么,接触程度的前提是距离,社交距离的远近决定了接触的难易程度和频率。因此,社交距离是可能影响贫困搬迁户人力资本存量低、社会资本失灵导致社会融入缓慢的因素。

本文着重考察社交距离对搬迁户社会融入的影响。这是因为社会融入相关研究较为强调搬迁户与原居民的接触和互动过程,本质上是由社交距离的远近所决定的^[20],即社交距离可能是解释搬迁户社会融入变化更为合理的因素。而现有研究在社交距离与社会融入相关的分析方面较为欠缺,本文的分析结论可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在物理距离、心理距离以及受偏见程度等3种不同类型的社交距离中,物理距离对易地扶贫搬迁户社会融入的影响最为直接。对本文而言,物理距离是指搬迁户与原居民在空间和地理层面的远近,反映的是搬迁户与原居民在空间和地理层面相互接触的难易程度。物理距离越近,搬迁户与原居民在地理上接触阻碍越小,越有利于搬迁户融入社会^[21]。俗语“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便是刻画物理距离与群体相互行为的典型代表^[22]。值得注意的是,物理距离这一因素多与搬迁规划方案相挂钩,搬迁户难以改变这一客观事实。因此,从这个角度看,物理距离对易地扶贫搬迁户的影响相对外生。

心理距离对易地扶贫搬迁户社会融入的影响比较显著。心理距离是指搬迁户主观上认为自己与原居民交往的难易程度。这一距离往往较难测度,但能反映搬迁户主动接近原居民的自主动力。换句话说,心理距离的拉近往往意味着搬迁户与原居民间的关系从陌生转变为熟悉,这与搬迁户的社会融入息息相关^[23]。此外,心理距离在社会融入层面对搬迁户心理归属感和身份认同起引导作用,心理距离的变化意味着搬迁户心理归属感和身份认同发生改变,而这些都是社会融入的重要过程^[24]。

受偏见程度对搬迁户社会融入的影响虽然没有物理距离和心理距离那样直观,但却是制约搬迁户融入原居民所在地的最大挑战和主要障碍^[25]。对本文而言,受偏见程度主要反映搬迁户遭受来自迁入地原居民歧视和排挤的情况。受偏见程度越大,搬迁户在迁入地面临的潜在歧视越严重,社会融入的难度也越大。此外,原居民的偏见与歧视还在某种程度上会造成搬迁群体的内部团结现象,从而进一步限制搬迁户在迁入地融入原居民的进程^[26]。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社交距离是影响社会融入的重要因素,社交距离越大,社会融入水平越低。

H1:物理距离越近,越有利于搬迁户的社会融入。

H2:心理距离越近,越有利于搬迁户的社会融入。

H3:受偏见程度越深,越不利于搬迁户的社会融入。

三、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课题组对于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开展的跟踪调研数据进行分析,具体样本选取与数据介绍如下:首先,依据《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充分参考易地扶贫搬迁人口的地理区域分布、政策区域分布、安置模式和搬迁模式分布等因素,最终选取甘肃、陕西、四川、湖北、湖南、贵州、云南及广西壮族自治区为样本省份。其次,按照地理分布、政策区域、搬迁规模等因素,在每个样本省选择2个县,抽取15个来自武陵山片区、六盘山片区、秦巴山片区、滇桂黔石漠化片区和乌蒙山片区五大片区内的县(市),以及1个五大片区以外的国家级扶贫重点县,共计16个样本县(市),包括:甘肃省(古浪县、靖远县),陕西省(西乡县、紫阳县),四川省

(宣汉县、剑阁县), 湖北省(秭归县、建始县), 湖南省(沅陵县、平江县), 贵州省(水城县、威宁县), 广西壮族自治区(都安县、田阳县), 云南省(武定县、宣威市)。最后, 采取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抽样, 参照搬迁人口和搬迁计划, 在每个样本县(市)选取 2~3 个乡镇, 在每个乡镇随机选择 3 个行政村或自然村, 每个村随机抽 1~2 个村民小组, 每个小组随机抽 8 户建档立卡贫困搬迁人口, 并随机匹配抽取 1~2 户非贫困户的同步搬迁人口。此外, 为了保证样本量的平衡, 每个样本县(市)的样本规模应至少满足 120 户建档立卡贫困搬迁人口和 15 户非贫困同步搬迁人口。

课题组于 2016 年 6—7 月开展基期调研, 2017 年 7 月、2019 年 5 月分别进行两期跟踪调查。本文使用的样本主要来自 2019 年追踪调研的截面数据, 原因在于 2019 年距 2015 年易地扶贫搬迁启动基期间隔 3 年时间, 是观测搬迁户社会融入变化的较为合适的时间分段; 2016 年、2017 年已搬迁户不足 500 户, 样本容量较少, 而 2019 年已搬迁户 1231 户, 可以较好地反映其社会融入状况。本文将使用该 1231 户已搬迁人口作为研究对象。

(二) 模型设定、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1. 模型设定

为研究社交距离与社会融入间的因果关系, 使用普通最小二乘(OLS)作为基准回归的模型设定形式, 考虑如下社交距离与社会融入的计量模型:

$$SI_i = \beta_0 + \beta_1 SD_i + \beta_2 X_i + \varepsilon_i \tag{1}$$

(1) 式中, SI_i 表示搬迁户的社会融入程度, 核心解释变量 SD_i 为社交距离, 在具体的回归方程中分为物理距离、心理距离和受偏见程度 3 类。 X_i 为影响社会融入的一系列控制变量, 包括搬迁户的基本特征、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家庭特征、搬迁政策等。

2. 变量选取与描述统计

(1) 核心被解释变量: 社会融入程度。使用搬迁人口对自身社会融入的主观评价进行测度, 并标准化为 0~100 分。

(2) 核心解释变量: 社交距离, 包括物理距离、心理距离和受偏见程度。物理距离使用搬迁户在迁入地距繁华集市的最短物理距离进行衡量; 心理距离使用搬迁人口在与原居民交往的过程中是否担心被骗的程度来衡量; 受偏见程度采用搬迁人口在迁入地受到原居民偏见的主观感受程度进行衡量。

(3) 控制变量。参照社会融入相关研究, 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 户主特征变量(性别、年龄、是否党员、是否干部), 家庭特征变量(家庭规模、劳动力比例), 人力资本(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技术培训), 社会资本(原有社会网络、新增社会网络), 搬迁因素(安置方式、安置位置、搬迁时间)等。

具体的变量选取、定义及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从核心被解释变量来看, 搬迁户的平均社会融入程度较低, 均值为 48.189 分。社交距离方面, 搬迁户距迁入地最近集市物理距离约为 7.4 公里, 可见搬迁户离较为热闹的集市距离较远, 这可能与安置区的建设位置有关。心理距离均值约为 3 分, 说明搬迁户与原居民间的心理距离较小, 这可能与易地扶贫搬迁主要以村内、乡镇内、县内安置有关。受偏见程度在迁入地受到原居民偏见的主观感受程度约为 4.9 分, 搬迁户受到歧视与偏见的程度处于一般水平。

从人力资本水平来看, 易地扶贫搬迁户的受教育年限平均 5 年左右, 基本为小学及以下水平, 这就意味着搬迁户凭借自身能力在迁入地很难获得较好的工作岗位和经济回报, 需要迁入地配套技术培训、就业扶持等。健康状况是最基本的人力资本, 健康的体魄是劳动力发挥作用的前提, 61.7% 的搬迁户身体健康, 仍有较大比例的搬迁户身体不太健康, 因病致贫也是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移民搬迁群体在迁入地赖以生存的重要人力资本是技术水平, 易地扶贫搬迁也

充分考虑到这一因素,为所有搬迁户进行不同类别的技术培训及职业培训等。从数据看,搬迁户平均参加技术培训次数在 1 次以上,虽然保障了每人都参加过培训,但次数较少。

移民搬迁群体在迁入地的另一依赖的重要因素是社会资本,由于搬迁户原有的社会网络在迁入地可能失去作用,在迁入地新结识的社会网络则可能会更加关键。从个人和家庭特征来看,样本是针对户主进行问卷调查的,以男性为主。搬迁户以中老年人为主,平均年龄 55 岁左右。党员比例和干部比例均不足 10%,搬迁户参与党组织与基层管理工作比例较小。搬迁户家庭人口数量为 4 人左右,劳动力占比 66%,平均来看搬迁户家庭大多以 2~3 个劳动力为主。

从搬迁因素来看,主要以集中安置为主,占比 75.5%,这也与“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中的 76.4%接近,进一步证明了样本选取的合理性。城镇安置是主要的位置选择,占比 65.9%,其可为搬迁户提供更优越的社会经济环境。在不考虑项目成本的情况下,城镇安置是较好的安置方式。截至 2019 年,搬迁户平均搬迁时间为 16 个月左右。

表 1 变量界定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社会融入	受访者自身融入本地的主观评价(0~100 得分)	48.189	20.239
物理距离	距迁入地最近集市的物理距离(公里)	7.370	10.980
心理距离	与迁入地居民交往是否担心被骗(1~10 担心程度)	3.006	1.647
受偏见程度	在迁入地受到原居民偏见的主观感受程度(1~10 偏见程度)	4.898	1.964
受教育年限	户主受教育年限(年)	5.110	3.350
健康状况	健康水平(1=健康,0=不健康)	0.617	0.486
技术培训	参加技术培训次数(次)	1.242	2.995
原有社会网络	迁出地社会网络;原有朋友数量(人)	41.371	66.761
新增社会网络	迁入地社会网络;新结识的朋友数量(人)	31.140	39.760
性别	性别(1=男性,0=女性)	0.929	0.258
年龄	户主年龄(岁)	55.030	12.120
是否党员	是否党员(1=是,0=否)	0.080	0.280
是否干部	是否干部(1=是,0=否)	0.030	0.170
家庭规模	家庭规模(人)	3.840	1.530
劳动力比例	家庭劳动力占比(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总人口数)	0.660	0.290
安置方式	集中安置=1,分散安置=0	0.755	0.43
安置位置	城镇安置=1,乡村安置=0	0.659	0.474
搬迁时间	搬迁时间(月)	16.330	9.950

四、实证分析

(一) 基准回归

表 2 汇报了截面数据 OLS 模型的估计结果,模型(1)—模型(3)分别是物理距离、心理距离和受偏见程度对社会融入的估计结果,模型(4)是三类社交距离变量同时对社会融入回归的结果。从表 2 可以看出,无论是单个社交距离变量进入回归,还是 3 个社交距离变量同时进入回归,物理距离、心理距离、受偏见程度的估计系数均为负,并且通过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表明社交距离越远,社会融入程度越低,即社交距离的增加阻碍了搬迁户在迁入地的社会融入。三类社交距离同时放入回归方程时,其回归系数相较于分别进入回归方程时存在差异,但符号相同,仅存在数值差异且差异较小。因此,3 个社交距离变量间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对回归结果的影响不大。

表 2 社交距离与社会融入——基准回归 (N=1231)

变量名称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物理距离	-0.145 *** (0.036)			-0.131 *** (0.034)
心理距离		-1.497 *** (0.182)		-1.326 *** (0.185)
受偏见程度			-0.938 *** (0.158)	-0.687 *** (0.159)
受教育年限	0.140 (0.108)	0.130 (0.107)	0.114 (0.108)	0.104 (0.105)
健康状况	2.108 *** (0.627)	1.757 *** (0.617)	1.845 *** (0.633)	1.432 ** (0.612)
技术培训	0.263 *** (0.074)	0.230 *** (0.077)	0.216 *** (0.074)	0.166 ** (0.076)
原有社会网络	-0.010 (0.018)	-0.016 (0.018)	-0.001 (0.018)	-0.013 (0.017)
新增社会网络	0.020 *** (0.007)	0.018 *** (0.006)	0.020 *** (0.006)	0.018 *** (0.006)
性别	-1.241 (1.118)	-1.167 (1.137)	-1.282 (1.126)	-1.236
年龄	0.056 ** (0.027)	0.038 (0.027)	0.052 * (0.027)	0.030 (0.027)
是否党员	2.077 * (1.238)	1.632 (1.234)	1.633 (1.254)	1.827 (1.199)
是否干部	2.852 * (1.640)	2.141 (1.562)	2.262 (1.659)	2.208 (1.559)
家庭规模	0.563 ** (0.232)	0.401 * (0.232)	0.460 ** (0.232)	0.401 * (0.226)
劳动力比例	2.518 ** (1.035)	2.338 ** (0.996)	2.360 ** (1.035)	2.523 ** (0.991)
安置类型	-2.101 *** (0.788)	-2.028 *** (0.778)	-2.205 *** (0.783)	-2.148 *** (0.766)
安置位置	3.800 *** (1.149)	2.587 ** (1.087)	2.597 ** (1.116)	3.681 *** (1.119)
搬迁时间	0.240 *** (0.034)	0.235 *** (0.034)	0.231 *** (0.034)	0.228 *** (0.033)
省级虚拟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46.681 *** (2.924)	52.750 *** (2.973)	52.420 *** (3.110)	56.597 *** (3.076)
R ²	0.238	0.262	0.244	0.287

注:括号内数字为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5%、10%统计水平上显著;下同。

控制变量回归结果的符号和显著性水平符合本文的预期,且较为稳健。首先,在人力资本方面,以贫困户为主的搬迁户拥有较低的人力资本水平,描述性统计结果已显示搬迁户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在小学 5 年级,而回归结果中受教育程度始终不显著,可见贫困户的社会融入需要其他类型的人力资本发挥作用。从贫困户自身来说,健康状况在 1%显著性水平下为正,健康的体魄是搬迁户融入社会的基础条件;从迁入地配套扶持政策来看,搬迁户参加技术培训对社会融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也与相关研究的结论一致^[27],技术水平是决定搬迁户社会融入的重要因素之一。

其次,在社会资本方面,本文的研究结论与已有研究和现实情况一致。由于搬迁改变了搬迁户的居住环境,其在迁出地原有的社会资本很难发挥作用,甚至出现失灵,这也与本文的回归结果一致,原有社会网络的估计系数始终不显著。而与之相对应,在迁入地新结识的社会网络对社会融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社会网络为搬迁户提供了获取资源和适应生存的渠道。在个人特征及家庭特征方面,对比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性别、年龄、党员身份、干部身份这些个人特征无法对搬迁户的社会融入起到促进作用。家庭特征对于社会融入的促进作用则更为明显,家庭规模、家庭劳动力比例均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

最后,作为搬迁的重要决定因素,搬迁政策因素对社会融入的影响也十分重要。安置类型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说明集中安置阻碍了搬迁户的社会融入,这可能与相关研究在群体移民活动中发现的“内部团结”现象相似,即集中安置区内部会形成资源利益统一整合的现象,减少甚至拒绝与迁入地原居民的交流与相处,典型的如美国的墨西哥移民形成的贫民窟,华人移民形成的唐人街等^[28]。安置位置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说明安置到城镇更有利于搬迁户的社会融入,在不考虑政策成本的情况下,城镇安置应是易地扶贫搬迁解决搬迁户社会融入问题的主要手段,这依赖于城镇地区相对优越的社会经济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因为经济基础和基础设施建设可能会给予搬迁户更好的选择和机遇,促进其更快、更好地适应迁入地生活。

搬迁时间是决定搬迁户社会融入程度的另一因素,搬迁时间越久,社会融入也越顺利。

(二) 内生性讨论与处理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社交距离分为物理距离、心理距离和受偏见程度,如果同时进入回归方程,内生性将较为复杂且工具变量不好统一,因此,将 3 类变量分开进行内生性讨论与处理。

在搬迁时,安置方式和安置位置已经决定了搬迁户与原居民间的物理距离,因此可以认为物理距离与社会融入之间较为外生,但是由于遗漏了心理距离和受偏见程度,存在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需要选取合适的工具变量予以解决。本文选取家庭所在位置海拔高度和所在安置区安置规模作为物理距离的工具变量,因为海拔高度和安置区规模会影响搬迁的规划和位置,即以上两个工具变量与搬迁户和原居民间物理距离相关,满足工具变量相关性的要求。同时,选取的工具变量相对外生,不会直接影响搬迁户的社会融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工具变量相关性和外生性的基本要求。

心理距离和受偏见程度 2 个变量在对社会融入进行回归时,除了存在遗漏变量问题外,还存在较明显的反向因果关系。例如,随着心理距离的变化,社会融入会相应产生变化,当社会融入得到促进或阻碍时,又会反过来影响搬迁户与原居民的心理距离,因此存在由反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受偏见程度与社会融入之间同样如此。工具变量的选取以心理距离为例,本文选取搬迁户所在安置区或村内其他搬迁户与原居民的心理距离,和迁入地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相关政府文件或新闻中,心理距离相近字词出现的次数作为工具变量。原因是其他搬迁户与原居民间的平均心理距离会对搬迁户自身与原居民的心理距离产生影响,但其他搬迁户的心理距离不会对其社会融入产生影响,政府文件或新闻中心理距离相近字词出现的次数同样不会直接对社会融入产生影响,但可能会影响搬迁户的心理距离,因此选取的 2 个工具变量符合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和外生性的要求。受偏见程度作为解释变量时,工具变量选取的是除自身以外安置区或村内其他搬迁户的平均受偏见程度,以及迁入地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相关政府文件或新闻中受偏见程度相近字词出现的次数,原理与心理距离类似,故在此不再赘述。

物理距离回归方程中使用的两个工具变量,以及心理距离和受偏见程度回归方程中的除自身平均程度来自调研数据,而心理距离与受偏见程度相近字词出现的次数来自“爬虫抓取+文本分析”得到的数据。具体做法是:第一,利用 python 的 requests 方法抓取百度新闻中样本县关于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的相关政策或新闻的数据,16 个县共采集 80 页搜索结果;第二,利用 beautifulsoup 将 html 转化为纯文本,并利用 ip 池规避网站反爬虫,最终获取各样本地区的文本文件;第三,使用 python 对各地区文本文件进行文本分析,分别将心理距离和受偏见程度相近字词出现的频次进行计数和加总,最终生成关于地区的工具变量数据。其中,心理距离的相近字词选取为“心理距离、心理、信任、心连心”,受偏见程度相近字词选取规则为“受偏见程度、偏见、公平、歧视”。各地区通过爬虫抓取和文本分析获取的数据如表 3 所示。

表 3 心理距离、受偏见程度相近字词频统计

省份	县城名称	心理距离频次	受偏见程度频次	省份	县城名称	心理距离频次	受偏见程度频次
甘肃省	古浪县	次数 4	次数 2	湖南省	沅陵县	次数 11	次数 4
	靖远县	次数 5	次数 6		平江县	次数 4	次数 0
陕西省	西乡县	次数 5	次数 5	贵州省	水城县	次数 7	次数 0
	紫阳县	次数 4	次数 8		威宁县	次数 25	次数 3
四川省	宣汉县	次数 7	次数 7	广西壮族 自治区	都安县	次数 17	次数 4
	剑阁县	次数 7	次数 12		田阳县	次数 4	次数 2
湖北省	秭归县	次数 7	次数 1	云南省	武定县	次数 0	次数 0
	建始县	次数 0	次数 0		宣威市	次数 30	次数 7

在回归之前,本文对所选取的工具变量进行了检验,表 4 汇报了工具变量的相关检验结果,其中模型(1)—模型(3)分别是 3 类社交距离对应的工具变量的检验结果。

表 4 社交距离对社会融入的影响——工具变量检验结果

检验类别与统计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不可识别检验;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p 值)	7.987(0.018)	21.913(0.000)	19.509(0.000)
弱工具变量检验;Cragg-Donald Wald 统计量	53.431	15.114	10.217
Stock-Yogo bias critical value;10% maximal IV size	8.680	8.680	8.680
15% maximal IV size	5.330	5.330	5.330
20% maximal IV size	4.420	4.420	4.420
25% maximal IV size	3.920	3.920	3.920
过度识别检验;Hansen J 统计量(p 值)	1.245(0.265)	1.538(0.215)	1.419(0.234)

从不可识别来看,3 个模型 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对应的 p 值均至少在 5%水平上显著,拒绝“不可识别”的原假设,所选取的工具变量符合秩条件成立的基本要求。从弱工具变量检验来看,Cragg-Donald Wald 统计量均大于 10%偏误下的临界值,拒绝“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假设。在过度识别检验方面,Hansen J 统计量对应的 p 值均不显著,意味着接受“所有工具变量均外生”的原假设,符合外生性的要求。综上所述,本文所选取的工具变量通过了相关计量检验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遗漏变量和互为因果关系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回归,具体的回归结果见表 5,与基准回归一致,模型(1)—模型(3)分别是物理距离、心理距离和受偏见程度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

表 5 社交距离对社会融入的影响——两阶段最小二乘(N=1231)

变量名称	模型(1)	模型(3)	模型(5)
物理距离	-0.193*(0.104)		
心理距离		-4.017*** (1.343)	
受偏见程度			-4.486*** (1.396)
其他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省级虚拟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42.031*** (2.910)	59.586*** (7.067)	72.559*** (10.702)
R ²	0.200	0.119	0.105

物理距离、心理距离、受偏见程度均至少在 10%以上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与表 2 基准回归的结论保持一致。当考虑了遗漏变量,以及社交距离与社会融入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而导致内生性问题的情况下,社交距离增加会阻碍搬迁户社会融入这一结论是显著的且稳健的。

五、异质性分析

基准回归中,无论是 OLS 还是考虑内生性的 2SLS 的回归结果均表明,社交距离与社会融入二者呈现显著且较为稳健的负向关系,即社交距离的增大在不同程度阻碍了搬迁户的社会融入。为了进一步分析社交距离对社会融入的影响在不同群体中是否存在异质性,本文从安置政策和搬迁户特征 2 个方面进行异质性分析。

在基准回归中,与搬迁政策有关的安置方式和安置位置两个变量始终表现出稳健的显著性,说明不同的搬迁政策可能导致社交距离对社会融入存在异质性。一方面,安置方式分为集中安置和分散安置。集中安置往往根据迁入地社会经济发展布局,建设有利于移民发展的大型安置区;分散安置将搬迁户插花分布于原居民内部,其居住模式和生活环境与原居民存在较大

差异。因此,社交距离对这两类安置群体的社会融入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异质性。另一方面,安置位置可以分为安置到城镇和安置到乡村。这两类搬迁群体面对城镇和乡村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时,其社会融入也会存在一定的异质性^[29]。

此外,由表 1 可知,易地扶贫搬迁户平均年龄为 55 岁,且平均受教育程度为 5 年左右,那么社交距离对社会融入的影响是否存在代际差异及人力资本回报差异? 本文将通过搬迁户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因此,本文的异质性分析具体包括安置方式、安置位置和搬迁户特征 3 个方面,为方便分析与比较,将物理距离、心理距离和受偏见程度分开回归,并且均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进行回归,具体工具变量的选择与检验与表 5 保持一致,在此不再赘述。本文的异质性分析使用解释变量与异质性分析变量的交互项进行解释,在控制社交距离和异质性分析所关注变量的同时,加入社交距离分别与安置方式、安置位置、搬迁户特征的交互项进行回归。相较于分组回归,使用交互项进行异质性分析的好处是不需要做组间系数差异检验,只需要解释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即可。

表 6 社交距离对社会融入的影响——异质性分析 (N=1231)

变量类别	物理距离	心理距离	受偏见程度
社交距离 * 安置方式	-0.312 *** (0.059)	-1.003 *** (0.239)	-0.469 *** (0.155)
社交距离 * 安置位置	0.242 *** (0.094)	0.748 *** (0.205)	0.432 ** (0.205)
社交距离 * 年龄	-0.001 (0.003)	0.019 ** (0.008)	0.014 ** (0.006)
社交距离 * 受教育程度	0.008 (0.008)	0.076 *** (0.028)	0.009 (0.021)
其他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省级虚拟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R ²	0.148	0.267	0.247

表 6 汇报了三类社交距离基于安置方式、安置位置和搬迁户特征的异质性分析。从安置方式来看,安置方式与三类社交距离的交互项均显著为负,这说明社交距离对搬迁户社会融入的阻碍作用在分散安置户中更大,即分散安置户更依赖于社交距离的变化。对于安置位置来说,安置方式与三类社交距离的交互项的系数均为正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相较于乡村安置,城镇安置更依赖于缩短社交距离以增加社会融入。安置政策与社交距离交互项的回归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在促进搬迁户社会融入时更应关注分散安置户与城镇安置户与原居民间的社交距离变化。

从社交距离与年龄交互项的回归结果中可以发现,年龄越大,心理距离和受偏见程度对于社会融入的阻碍作用越大,即心理距离和受偏见程度对于社会融入的阻碍作用更大与年龄呈正相关。即相较于老年人群体,年轻群体更容易打破社交距离的限制,社交距离对社会融入的影响存在代际差异。因此,地方政府在制定易地扶贫搬迁相关后续扶持政策时,应给予老年人群体更多的关注和保障。

受教育程度与社交距离的交互项显著为正,表明心理距离对于社交距离的影响与受教育程度呈正相关,这也与部分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搬迁户在社会融入过程中往往更容易产生心理隔阂^[30]。这是由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群体,在迁入地可选择的机会就越多,相较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更容易产生“逃离”心理,而对于在劳动力市场中没有优势的低受教育程度群体,则往往需要接受现实,主动接近原居民以获取更好的生存环境。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如何确保易地扶贫搬迁户在迁入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是保障脱贫攻坚胜利果实的

重要方面。随着易地扶贫搬迁项目最初阶段搬迁工程的全面完成,易地扶贫搬迁当下任务重心已逐步向搬迁户迁入地后续扶持转移,其中如何保障搬迁户在迁入地的社会融入,对于易地扶贫搬迁项目成败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基于2019年8省16县易地扶贫搬迁户的一手微观调查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上分析了社交距离对搬迁户社会融入的影响。研究表明,社交距离是影响搬迁户在迁入地社会融入程度的重要因素,物理距离、心理距离、受偏见程度均对社会融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结果较为稳健,使用工具变量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成立。此外,社交距离对社会融入的影响存在一定异质性,因不同安置政策和搬迁户特征表现出不同的影响,社交距离的增大对社会融入的阻碍作用对于分散安置户和城镇安置户更大。

我国易地扶贫搬迁人口在迁入地的社会融入主要面临以下问题:一是贫困搬迁户自主融入社会动力不足,缺乏有效引导,较为依赖社交距离等外界因素,而社交距离不是搬迁户单方面可以改变的;二是贫困搬迁户由于较低的人力资本、脆弱的社会网络,在搬迁地劳动力市场和社会生活中处于弱势地位,需要更多后续扶持政策的支持,否则容易再次返贫;三是以集中安置为主的易地扶贫搬迁,很可能由于迁入地原居民与搬迁户社交距离的增加,为保护自身的权益形成“内部团结”现象,最终与原居民形成“对抗”,不利于迁入地长期的稳定。

一方面,传统社会融入理论强调社会融入是搬迁户与原居民在生活习惯、经济条件等方面不断接近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离不开搬迁户与原居民的接触和交往,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正常的接触和交往因为社交距离过大而受影响,搬迁户并不能最终达到迁入地原居民的主流中层阶层水平,最终演化为边缘群体或贫困群体,与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初衷相违背。另一方面,在搬迁户缺乏良性的接触、互动的前提下,加上以集中安置为主的安置方式,会使搬迁户出于保护自身权益而形成“内部团结”,用以对抗来自迁入地原居民的偏见,这会使得搬迁户与原居民长期处于对立状态,既无法达到传统社会融入理论强调的均衡状态,也与部分同化理论中三类融入结果不尽相同,而是形成一种类似于西方社会“唐人街”的社会融入现象。

因此,加强搬迁户与原居民的接触、交往是保障搬迁户顺利实现社会融入的重要方面,本文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加强对易地扶贫搬迁户的后续扶持力度,通过技术培训和职业培训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保障贫困户的有效脱贫;第二,加强搬迁户与原居民的交往和互动,通过举办文化娱乐活动、相亲活动等形式,促进搬迁户与原居民有效交往并拉近心理距离,消除搬迁户与原居民间的心理隔阂;第三,为搬迁户营造公平、公正的生活环境,对原居民进行积极引导,消除对搬迁后的歧视与偏见,避免双方因利益纠纷而发生矛盾。

参考文献:

- [1] Borjas G J. The Economics of Immigration[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94, 32(4):1667-1717.
- [2] Galloway T A, Aaberge R. Assimilation Effects on Poverty among Immigrants in Norway[J].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005, 18(4):691-718.
- [3] Borjas G J. The Slowdown in the Economic Assimilation of Immigrants: Aging and Cohort Effects Revisited Again[J]. Journal of Human Capital, 2015, 9(4):483-517.
- [4] 冯伟林,李树茁,李聪.生态移民经济恢复中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失灵——基于对陕南生态移民的调查[J].人口与经济,2016(1):98-107.
- [5] 张晨,马彪,仇焕广.信息技术使用可以促进易地扶贫搬迁户的社会融入吗?[J].中国农村经济,2022(2):56-75.
- [6] Yamauchi F. Are Experience and Schooling Complementary? Evidence from Migrants' Assimilation in the Bangkok Labor Market[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4, 74(2):489-513.
- [7] Castro F G, Marsiglia F F, Kulis S, et al. Lifetime Segmented Assimilation Trajectories and Health Outcomes in Latino and Other Community Residents[J].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2010, 100(4):669-676.

- [8] 谢桂华. 中国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回报与社会融合[J]. 中国社会科学, 2012(4): 103-124.
- [9] Jun H J, Ha S K. Social Capital and Assimil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nd Foreign Wives in South Korea: The Case of Wongok Community[J].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15, 47: 126-135.
- [10] Collins W J, Zimran A. The Economic Assimilation of Irish Famine Migrants to the United States[J].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019, 74: 101302.
- [11] Lobodzinska A. Immigrants and Immigration Policy in Ageing Finland[J]. Bulletin of Geography Socio-economic Series, 2011, 15(15): 43-55.
- [12] Bartel A P. Where do the New US Immigrants Live? [J].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1989, 7(4): 371-391.
- [13] Qian Z, Lichter T. Social Boundaries and Marital Assimilation: Interpreting Trends in Racial and Ethnic Inter-marriage[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7, 72(1): 68-94.
- [14] Chletsos M, Roupakias S. Native-immigrant Wage Differentials in Greece: Discrimination and Assimilation[J]. Applied Economics, 2017, 49(17): 1732-1736.
- [15] Eguia J X. Discrimination and Assimilation at School[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17, 156(1): 48-58.
- [16] Boswell T E. ASplit Labor Market Analysi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Chinese Immigrants, 1850—1882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6, 51(3): 352-371.
- [17] Gordon M M.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The Role of Race, Religion, and National Origin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n Demand, 1964.
- [18] Portes A, Zhou M.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 Segmented Assimilation and Its Variants[J].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993, 530(1): 74-96.
- [19] Hirschman C. America's Melting Pot Reconsidered[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83, 9(1): 397-423.
- [20] Pagnini L, Morgan P. Inter-marriage and Social Distance among US Immigrants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0, 96(2): 405-432.
- [21] Akerlof A. Social Distance and Social Decisions[J]. Econometrica, 1997, 65(5): 1005-1027.
- [22] 王春超, 肖艾平. 班级内社会网络与学习成绩——一个随机排座的实验研究[J]. 经济学(季刊), 2019, 18(3): 1123-1152.
- [23] Berry J W. Immigration, Acculturation, and Adaptation[J]. Applied Psychology, 1997, 46(1): 5-34.
- [24] 侯亚杰, 姚红. 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模式与差异——基于潜类别分析的方法[J]. 人口研究, 2016, 40(2): 38-49.
- [25] Phinney J S, Madden T, Santos L J. Psychological Variables as Predictors of Perceived Ethnic Discrimination among Minority and Immigrant Adolescents[J].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998, 28(11): 937-953.
- [26] Esses V M, Jackson L M, Armstrong T L. Intergroup Competition and Attitudes toward Immigrants and Immigration: An Instrumental Model of Group Conflict[J].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1998, 54(4): 699-724.
- [27] Magnani N. Adult Vocational Training for Migrants in North-east Italy[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2015, 53(3): 150-167.
- [28] Sanders J M, Nee V. Limits of Ethnic Solidarity in the Enclave Economy.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7, 52(6): 745-773.
- [29] 张晨, 马彪, 仇焕广. 安置方式、社交距离与社会融入——来自中国8省(区)16县易地扶贫搬迁户的证据[J]. 中国农村观察, 2022(4): 153-169.
- [30] Akhtar S. A Third Individuation: Immigration, Identity, and the Psychoanalytic Process[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 1995, 43(4): 1051-1084.

(责任编辑: 刘浩)

How to Promote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Displaced Household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Resettlement Program: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Distance

ZHANG Chen, ZHANG Zhengyan, MA Biao

Abstract: Based on the micro-survey data of displaced household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resettlement program in 16 counties in 8 provinces in 2019,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impact of social distance on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displaced households theoretically and empirically.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ed that social distance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degree of social integration of displaced households in the place where they move in. Physical distance, psychological distance, and the degree of prejudice all have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social integration, and the results are relatively stable; social distance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social integration. There is a certain heterogeneity in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resettlement methods and resettlement locations, and the increase of social distance has a greater hindering effect on social integration for scattered resettlement households and urban resettlement households. Therefore, to improve social integr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continuously promote the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displaced households and the original residents, and promote the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relocated households and the original residents by holding cultural and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blind date activities, etc., and eliminate the psychological barrier between the displaced households and the original residents. In addition,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create a fair and just living environment for the displaced households, to eliminate the discrimination and prejudice of the original residents after the relocation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to avoid conflicts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due to disputes over interests.

Keywords: Poverty Alleviation Resettlement Program; Social Integration; Social Distanc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上接第 21 页)

Constructing the World of Meaning: An Important Path of Rural Culture Revitalization

HAN Yuxiang

Abstract: The choice of the path of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directly affects the effect of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overall rural revitalization. One of important paths of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can be developed by exploring the practical path with recreation and entertainment activities as a key point. The meaning world provides the goal, reason and basis of action for cultural practice, and constructs the behavior dynamic system of cultural practice. The key of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li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plete and rich world system of meaning, including life extension, social relations, social reputation, social power and selfless dedication. The construction logic of meaning world includes five mechanisms: administrative activation, social communication, social propaganda, autonomous organization and meaning implantation. Administrative activation provides lasting power for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meaning world; social communication constructs the social relation network between people; social propaganda realizes the reproduction of social reputation; independent organizations give cultural practice more organizational opportunities or organizational power, so that the organizer groups or volunteer groups can have multiple opportunities to show their social power to the village society; meaning implantation constructs the meaning value system of life continuation and selfless dedication through the use and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resources, ritualized actions and example. The meaning world has multiple functions-changing individual personality structure, ownership structu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ucture and power structure, and the “meaning world” under the path of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provides low cost and high quality of the spiritual and cultural products, strengthens the construction of ethics and nurturing rural talents, and promotes rural organizations autonomy ability, therefore, the construction of a meaning world is conducive to the overall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Keywords: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Meaning World; Recreation and Entertainment Activities; Rural Revitalization